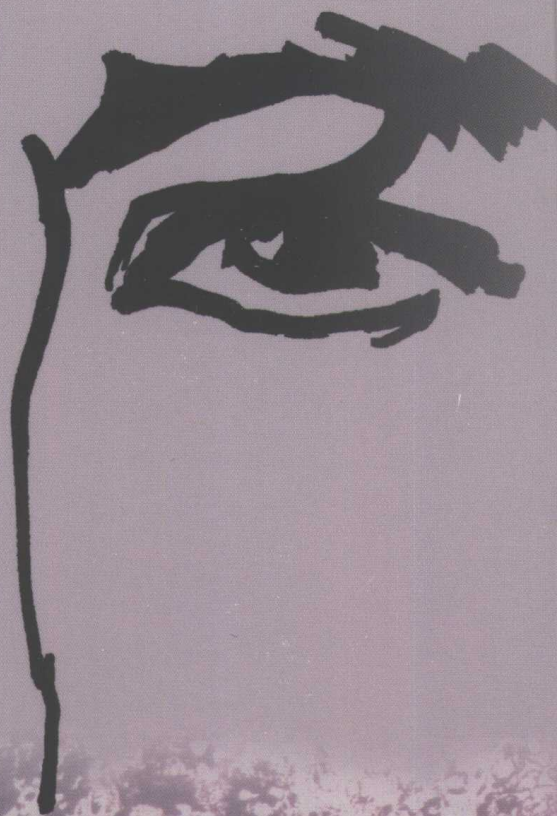




百年人生丛书

何济翔 著

沪上法治梦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百年人生丛书

何济翔 著

沪上法治梦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沪上法治梦/何济翔著. —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0
(百年人生丛书)
ISBN 7-5302-0624-9

I. 沪… II. 何… III. 何济翔-回忆录
IV. K825.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73868 号

沪上法治梦

HUSHANG FAZHI MENG

何济翔 著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5.625 印张 103000 字

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

ISBN 7-5302-0624-9
I · 609 定价: 11.00 元



序

我几乎以愤懑的心情看完了何济翔先生的这份自述，何济翔先生长我八岁，他比我更早立足于社会。在旧社会中，相差八岁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，我们都捧着一颗红心，投奔共产党。我们觉得只有共产党，才能救国救民，能把我们这个民族从深渊中救出来。实际上像我这样的人，当时对于共产党知道得很少，但听说谁是一个 CP 或 CY，就肃然起敬，把他们的话当做真理，愿意为他们披坚执锐，奋勇向前。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，就先后被捕过三次，然而向往共产党之心，却九死靡悔，百折不回。

我没有做过右派，不理解他们二十年的痛苦生活，读完何济翔先生的自述，心中隐隐作痛。中国五十多万知识分子，绝大多数经受了这样的生活，我却逍遥法外，自出意外。有人问我：冯英子，你为什么不是右派？我笑着说：大概是我的祖宗积德所致。我当然是玩笑，其实真正



说起来，其中可能也有许多因果关系。

我这个人，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，我父亲母亲都是文盲，家无隔宿之粮而日有索债之人，从小颠沛流离，断断续续读过五年小学，就走上社会，自谋生活了。我之所以成为新闻记者，倒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教育了我；我之所以向往共产党，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教育了我。当时只有共产党撑出救亡图存的大旗，一个中国的青年，能不跟着走吗？

解放的那一年，我正在香港担任《文汇报》和《周末报》的总编辑，一听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，马上想丢掉香港的工作，赶快回来担当起建设新中国的任务。我写信给范长江，写信给徐迈进，一句话，就是要回来。范长江和徐迈进写了五张纸的长信来训了我一顿，认为我不安心工作，“你在香港负责两张报纸，这不是革命吗？”可是要说服自己，并非易事。1952年，因为《周末报》的内迁，我终于不顾一切地回来了。谁知一回来就参加了“含有三反内容的思想改造运动”，一场运动下来，过去在香港亲如弟兄的朋友都变成了冤家对头。而且随着运动的结束，《周末报》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，《周末报》的人也由上头分别安排：总主笔胡希明被安排为广东省政协副主席，兼广东文史馆馆长；总经理苏怡被安排为广东省文化局的副局长；我这个总编辑则调上海工作。一到上海，我就被派到《新闻日报》去当秘书。

当时《周末报》就是这个“三驾马车”。这个安排，明显是对我的惩罚，而且是不小的惩罚，按我平常的脾



气，一定拂袖而去。但这时是我们日夜梦想的自己的政府，而且我已经回来了，我只能去《新闻日报》报到。

倒是《新闻日报》的秘书长鲁平先生，很快发现我不是做秘书的材料，也恰恰碰到《新闻日报》编辑部改组，才把我调到编辑部去。

经过这番变动之后，我才懂得赶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，完全是自己一种幼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，夹紧尾巴做人，才是知识分子的本分。当然，对共产党的英明，我丝毫没有怀疑。

反右开始之时，我正是《新闻日报》夜班编辑部的主任。当时的总编辑是刘思慕，党委书记魏克明先生为了照顾刘先生的健康，要他夜间十二点前就回家，十二点后，统统归我负责。有一天新华社发了一篇储安平关于“党天下”的文章，那一天，正好有一个印度尼西亚的足球队到上海来访问，我把这个新闻做了一版头条，而且配有每个球员的照片，却把储安平那篇文章，放在三版的下角登出。

第二天才发现，《文汇报》把储的文章放在一版做头条，《解放日报》也放在一版。于是《新闻日报》几乎全体同志贴了大字报，质问我为什么把储的文章放在三版。当天的编前会议上，很多同志指着我的鼻子，要我回答这个问题。

我有什么好讲呢？我说我曾与储安平同事，他的文章常常荒腔走板，所以我不同意放在一版。后来储安平果然因这篇文章被打成右派，而《文汇报》也戴上了一顶资产



阶级帽子，独独《新闻日报》平安无事。

还有一次，有位编辑在新华社稿中，发现一个葛佩琦的发言，他说“没有共产党，中国也不会亡国”。编辑把这份稿子推荐给我，我看了之后，决定不登。我说照我的经验，没有共产党号召的救亡图存，我们可能要亡国的。因此，这个发言没有在《新闻日报》上见报。

这两件事，很反映我当时的立场的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对于共产党都有一种九死靡悔的感情，我从两个总编辑而变成《新闻日报》的小秘书，明知这样安排不公平，但也无怨无悔，勤奋工作，反右之轮不到我，大概与此有关。鲁平同志有次对人说：“冯英子这个人嘛，除对×××同志有些意见外，其他是没有问题的。”

何齐翔先生说，他之去做几十年农民，完全是出于他们小组长的作成。其实这种事也很多，右派在可划和不划之间，常常是由领导者一句话决定的。记得有一次，《新闻日报》的编委会中，有一位先生本来是要划为右派的，但他是某某首长的亲戚，领导讲了一句“算了吧”，此君就未成右派。不过后来照样把他送去了大西北，“丁年奉使，皓首而回”，他重返上海时，已经白发满头了。

我对于这次反右运动，思想上一直无法接受。比如何文中提到的陈伟斯先生，他当时是《新闻日报》的美术组组长，因为奉命组织了杨兆龙的文章，被打成右派，其中有一条说他冒充党员，我听后百思不得其解。我知道他在解放前夕，在苏州设立了一个电台，与苏北通讯，苏北也派了两个人来，住在他家。他夫人为了掩护和照顾他



们，把工作也辞掉了。一个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冒充共产党员，岂非是跟自己过不去吗？所以陈伟斯成为右派之后，我照样到他家中去看他。陈伟斯说，他成为右派之后，好像处身在冰窖之中，没有一个人理睬他，我是惟一使他感到温暖的人。我知道，杨兆龙文章是他去组织的，而经过我手发排的，我当然也通读了这篇文章，觉得一个国家要走上轨道，非讲法治不可，然而要求法治竟成为反党的纲领，我是无论如何想不通的。很坦白的说，在 1957 年之前，我们这批知识分子，一直把共产党当做亲生的爷娘，绕在她的膝下，是人生最大的愉快。我丢掉香港两个总编辑不当，载歌载舞地回来，来做《新闻日报》一个可有可无的秘书，不是出于对党的爱戴之情吗？冒着杀头的危险，把电台办在自己家里，竟然说他冒充共产党，这是我目睹的事实，我冒着危险去看陈伟斯，也是安慰他，人间的正气毕竟是存在的。

反右结束之时，有一条规定，右派可以自谋出路。陈伟斯有一个弟兄是高级军官，陈伟斯想找一个自食其力的工作，大致不难，因此他选择了“自谋工作”这一条，不料即被逮捕，送到安庆去改造了。报社还有其他人员，也遭到同样命运。

反右以后，柯庆施当时还提出了一个“拔白旗、掺沙子”的口号，把报社一些文化较高的，包括不是右派的，都送到宁夏去“支援”《宁夏日报》。而《宁夏日报》说根本没有向《新闻日报》要人，所以除了极少数安排在报社之中，其他都安插到外地一些单位中去了。而《新闻日



报》呢，弄一些连新闻也写不成的工农干部来“掺沙子”。《新闻日报》有一个非常具有凝聚性的编辑部，沙子越来越多，凝聚性自然越来越差了。赴宁夏那批人出发之时，我到火车站去送他们，执手无言，相对唏嘘，那一天我竟然步行回家，连公共汽车也没坐，但觉人间不平，竟至于此。

没有人不承认，1957年以前，我们国家确实出现过一个欣欣向荣的局面，旧社会的弊病已经一扫而空，每一个干部都认认真真，尽其全力。海外的知识分子，莫不载歌载舞，很多人欣然回国。而这时却出现了反右，把全国五十多万知识分子，一律打成右派，正如何济翔先生所说，每户以三口计，全国有一百六十五万人不得安生。而反右以后真正出现的问题还并不在此。首先，舆论一律了，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再被告知要夹着尾巴做人，柯庆施并且总结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特点，一曰懒，一曰贱。这是对知识分子最大的侮辱，可是，有哪一个知识分子敢出来否认吗？聂绀弩先生在世时，有一次我们谈到对《武训传》的批判。他说，他早已看出这批判是不对的。我说：你那时为什么不站出来说？他说：那时敢说吗？说了就变反革命！批《武训传》已经如此了，那么反右不是比批武训扩大了千倍万倍吗？

反右中还有一个现象，就是对民主党派表现得特别狠。“章罗联盟”当然是一个神话，而据某中央领导说民盟表现得特别坏，因此民盟在反右上也特别要将功补过。上海民盟恢复活动时，印发过一份改正后的右派名单，其



中很多人名字上围上黑框，我看得热泪盈眶，虽然其中人物，我都不相识。有人说，有人是因为加入了民盟，才变成右派的，此事找不到证据，我也是在反右前加入民盟的，因此对当时民盟的当权派，也是敬而远之的。据也做了右派的徐铸成先生告诉我，他有些话是与某君一起说的，后来某君“反戈一击”，全部推到了徐的头上，徐终于成为右派，而某君却火线立功，成为光荣的、伟大的、正确的共产党党员了。每次运动有百分之一、二、三的人入网，每次运动也有百分之一、二、三的打手立功，循环往复，几十年来，难言之矣。

反右第二个后果是一言堂的确立，而作假也就有了市场。因为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，听不到一点不同的意见，于是真以为自己是天纵神武，无所不能了，一个心血来潮的时候，想做什么便做什么，一声令下，全国照办。什么人民公社，这个亩产三万斤，那个亩产六万斤；什么大炼钢铁，举国骚然。而最最重要的，那时不说假话不行，上面要听的是假话，自己陶醉在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幻想中，下面自然足尺加三，大叫吃饭不要钱了。那场由人制造出来的自然灾害，许多本来是鱼米之乡的地方也饿死了不少人。何济翔先生若干年的饥饿感，同被饿死的人比起来，也可以说是上上大吉，这是政府对劳改犯的天高地厚之恩，也是何老先生自己祖宗的积德吧。

严格地说起来，没有那次反右，也许可以避免后来那些灾难，而后来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实际上也是反右的继续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就是“无法无天”这四个字的实践。



无法无天，把国家弄到几乎崩溃的边缘，这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，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噩梦。

何先生这本《沪上法治梦》写的是何先生二十年右派生活的实录，我随着他走出上海，到铅山、到彭泽，一直到他改正回沪，加入共产党，既悲痛欲绝，又为他庆幸。当然，何先生一个人的遭遇，实际上也是五十多万右派生活的反映。在“胡风反革命”那个案子中，毛泽东在《按语》中写过“苏州一同志，反革命在向你招手了！”一句，这个同志就一世不得翻身，一世不曾成家，孤苦伶仃，最后是自杀了的。向他招手的倒不是什么反革命，却是阎罗王。俞明同志就此事，写过一篇题为《招手》的小说，发表在《苏州杂志》上，我读了之后，泪如雨下，几夜都想着同志的不幸。过去我们读书，读到“草菅人命”这样的句子，以为一定是石勒、朱全忠之所为，常常义形于色，现在我们生逢盛世，对于这些故事反而见怪不怪。

何济翔先生是因为同情杨兆龙要求立法而被指为反党，划为右派的。他们当年在座谈会上，“有的同志说，解放后大学毕业到了法院工作三年，还是一个书记员，而工农干部一来就是审判员”，这种知识分子同工农干部之间的差别，其实是带有普遍性的。问题倒是五十年前讲的司法界的情况，今天完全得到了纠正没有呢？这几年来，我亲耳听到的，亲眼见到的，就有好几桩案子可谈。上海有一个法官办一桩民事官司，却带了手铐到被告人的家中去抄家，抄走了东西又不给收据，那不是知法违法吗？可是这个法官一度是“十好”的候选人，后来经受害者提了



意见，才不了了之的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少年参加革命，曾是《青岛日报》的总编辑，反右后调为上海《解放日报》编委，后又调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审。70年代，他要搞一个华侨疗养院，因为这个疗养院有二百万美金的收入，有批准的二十个城市户口，于是有关上级眼红了，要他交出来由上面来办，他不给，就给他加上一项“诈骗”的罪名，把他抓起来关了三年。后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、全国侨办，还有一个什么全国机构查明他是无辜的，法院也查明这个“诈骗”犯没有诈骗过一个铜板，但由于上海一位政法书记说他是“诈骗”，迄今不得平反。这位八十岁的老人，每月仅靠上海人民出版社发的一百五十元及里弄帮助几十元生活。今天我们国家强调要以法治国，并已把以法治国写入《宪法》，实际上说明了以法治国，并非易事。

而且即使“法”胜利了，真正能使原被告双方心平气和地执法了吗？也不见得！徐州的袁成兰，被当地文化局长所告，官司打到南京江苏高等法院，袁成兰是胜利了，可是袁成兰不敢再住在徐州，远走南方去谋生了。我曾说袁成兰的胜利是“惨胜”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那样罗织罪名的原告还大模大样地在台上，以法治国，在这些地方不能不打上折扣。所以严格说起来，比以法治国更重要的，恐怕是以法治官。

今天读何济翔先生当年罗织成罪的经历，有些宛在目前，我们跋涉了五十多年曲折的道路，以法治国，还是一个头等的重要事情，还有待在中央的推动下，广大的仁人



志士，为之不懈努力。

我赞成何济翔先生这本书的出版，一是希望我们广大的读者，真正了解当一个人被打成右派后过的是什么生活；二是希望这种自毁长城的蠢事，永生永世不再发生；三是希望我们的以法治国，真正能够深入人心，深入官心，成为治世的准则。不辜负何济翔先生以垂暮之年现身说法，为时代留下真实的一页。

我同何济翔先生是在民盟认识的，我们在同一个学习小组里，评论时事，月旦人物，我们常有相同的看法。我不是正规知识分子出身，也没有做过右派，因而头脑中的条条框框较少，高谈阔论，无所顾忌。何先生说我是侠客，“儒以文乱法，侠以武犯禁”，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都不受人欢迎的。好在何先生已九十三岁，我也是八十五岁的人了，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，总是好事。我想这本书是应当传世的。

拉杂写来，聊代序言。

冯英子

1999年3月29日



自序

我虚龄九十三岁之年，撰成此书，不觉掷书而叹！我一生平顺、与世无争，不料半百之年，忽逢大难，沉沦二十年。寻思其故，我国有推倒旧江山开创新世界之伟大革命领袖如毛泽东，但缺乏安抚四方使万民有如水归壑之乐的民主与法制。美国华盛顿于独立战争后，有他昔日的好友劝他做皇帝，被他一顿斥责，这是美国民主传统的根源，民于今受其惠。美国是旧蛋壳里孵出的新国家，民主乃其必然，但此说亦自有理。至今美国成为头等强国，诺贝尔奖获得者众多；所以然者，由于美国科技实力，至今居世界霸主地位。而科技实力与政治上的民主不可分。美国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 R. 费曼著书论科学与社会的关系，他以职业科学家的视角来看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，科学才能健康发展。他指出科学的根本动力在于怀疑，在于对已有的确定性的挑战。一个科学家如果想要真正解决一个什么问题，他必须为未知因素和疑问留下位置。他必



须时时质问自己，是不是已往的回答还不够好。只有这样，科学才能持续向前发展。费曼指出，在科学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亲缘性，两者是互依互存的。

我国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，有人向他喊“万岁”，为他所坚决反对，这是民主的曙光。至今，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，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呼声，尚待跟踵。社会主义与民主和科学，密不可分。这是吾人始终追踪之目标，现今党领导人民治国的方略，是依法治国，故必以法治为准则。

此书前稿多年前曾胎死腹中，今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，顺应国际潮流，不断取得新的进步，此书得以问世，是时代之幸。是为序。

何济翔

1998年10月于沪寓



目 录

序	冯英子 (1)
自序	(1)
引言	(1)
一、痛苦的批斗	(4)
二、从农村到收容站	(46)
三、江西铅山上海农场	(58)
四、马当采石厂	(67)
五、彭泽芙蓉农场	(77)
六、悲剧的终结	(104)
[附录一] 司法工作“墙”高“沟”深 民盟召开司法座谈会旁听记	(116)
[附录二] “社联”回忆	(120)
[附录三] 失画记	(124)
[附录四] 杨门浩劫	(127)
[附录五] 牙膏皮事件始末	(149)
后记	(162)

引 言

众所周知，1957年夏季在中国大地上爆发的反右运动，是中国数十万知识分子的一场浩劫，直接受害者达五十万人之多，包括他们的家属，若每户以三口计，就达一百六十五万人之多，这还不包括所谓内定右派，以及作家叶永烈在《沉重的一九五七》一书中所说的中右分子和立场不稳分子。受害者之众，可谓空前，相信也一定是绝后的（九年后的“文革”那又是另外一件事，除外）。不才亦不幸卷入其中，以正当言论横被无理批斗，戴上右派帽子；而且被定为极右分子，开除公职，实行劳动教养。包括后来所谓就业，乃是劳教继续，实际过着长达二十年的囚徒生活。刑法规定最高刑期为二十年，这不是等于我被判二十年徒刑吗？二十年的政治苦难，使我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，精神与物质受到很大的损失，至今回首，犹然触目惊心。二十年的囚徒生活，使我七十三岁脱离牢狱之灾后将近又一个二十年中，犹时时梦在度过二十年的农场